山西票庄考略

陈其田　撰

经济管理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晋商研究经典文库/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主编．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1
ISBN 978－7－5096－0184－6

Ⅰ．晋… Ⅱ．山… Ⅲ．商业史—研究—山西省
Ⅳ．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2193 **号**

出版发行：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11 **层**

电话：（010）51915602　**邮编：**100038

印刷：　　**经销：新华书店**

组稿编辑：杜　菲　　**责任编辑：杜　菲**

技术编辑：晓　成　　**责任校对：龙　萧**

720mm×1000mm/16　　7.25 **印张**　　111 **千字**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全 5 **册**　**总定价** 160.00 **元**

书号：ISBN 978－7－5096－0184－6/F・18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印装错误，由本社读者服务部
负责调换。联系地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

电话：（010）68022974　　**邮编：**100836

引　言

山西票庄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占据很重要的地位。从时间上说，它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从地理上看，山西票庄的势力范围，北起莫斯科、库伦、蒙古；南至云南、广东、新加坡；东至日本；西达新疆、四川。以山西的祁县、平遥、太谷三县的商人为中心，支配这么广大的营业地域，经过这么长久的时间，这种经济制度很有研究的价值。

我国旧式的经济制度，重信用，轻组织，资本虽小，营业甚大，一切都是以人为中心，鲜有业务的保障。经济的活动建筑在家族主义的基础上，山西票庄可以说是这种旧式经济制度的典型。票庄虽有它的独创价值，巧妙的营业方法，可是不适合近代的社会，终致倒闭失败。我们研究山西票庄，就可以看出旧式经济制度的弊端及其应该改革的地方。

还有一点我们应当注意，就是山西票庄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生活贡献甚大。我们研究山西票庄可以知道商业与金融的关系，可以明白旧式资本与旧式官僚的结合。票庄营业以汇兑为主，所以受交通工具的影响。票庄兜揽国库官款，颇有变态国家银行的意味。票庄推行票据制度，开近代银行业的先河。清末，票庄曾一度执全国金融界的牛耳。这些功绩，不能磨灭。

山西票庄的重要性，已如上述，为什么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见一本山西票庄史呢？这是因为我国商业习惯谨守秘密，缺乏记载，山西人经营票庄，更是如此。作者这几年来，四处搜罗关于山西票庄的材料，所得都是断简残篇，并且大半是辗转

抄袭的。三年前到太原及票庄总号所在地——祁县、平遥、太谷实地调查，票庄遗老所能供给的材料，也是一些零碎的传闻及片断的记忆。去年在日本的时候，又极力向各经济调查所及各专家索取有关票庄的文献，所得的结果也是很少。现在把这几年所收藏的材料，略加整理，付印发表，借以就正于海内外专家。希望这本极不完全的初稿，能够引起硕学鸿儒的注意，不久或有一本比较完满的山西票庄史出世，以慰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人们的热望。

民国二十五年五月序于北平燕京大学

总　序

山西是中国商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山西商人是中国经济史上的劲旅，明清晋商更是因创造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历史奇迹而成为当时中国十大商帮之巨擘。历代晋商及其成就的辉煌事业虽然早已渐次消逝，但他们从崛起到兴盛、由兴盛而衰落的史实却蕴藏着丰富而绚烂多彩的知识瑰宝，在经济、管理、社会、艺术、法律等多学科领域都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学术界对晋商的关注始于清末民初。民国时期，涌现出了一批关于晋商——特别是票号——的史料汇编、调查报告、论文、论著，比如李宏龄的《同舟忠告》（民国六年太原监狱石印）和《山西票商成败记》（民国六年太原监狱石印），韩业芳的《山西票庄皮行商务记》（民国十年煤油印），双一的《中国各省钱业调查录·山西省》（《钱业月报》第二卷第十二号），严慎修的《晋商盛衰记》（民国十二年铅印），东海的《记山西票号》（《银行周报》第一卷第七、八号连载），范椿年的《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中央银行月报》第四卷第一号），卫聚贤的《山西票号之起源》（《中央银行月报》第四卷第六号）、《山西票号之最近调查》（《中央银行月报》第六卷第三号至第七卷第二号连载）和《山西票号史》（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1944 年出版），秦省如的《山西票庄在今昔经济上之地位》（《钱业月报》第十五卷第七号），陆国香的《山西票号之今昔》（《民族》第四卷第三期）和《山西之当质业》（《民族》第四卷第六期），蒋学楷的《山西省之金融业》（《银行周报》第二十卷第二十一期），侯兆麟的《近代中国社会结构与山西票号》（《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 年冬季号），李渭清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山西太谷银钱业之今昔》（《中央银行月报》第六卷第二号），陈其田的《山西票庄考略》（商务印书馆，1937 年出版），等等。这些文献既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本身也具有一定史料价值，堪称经典。然而，这些文献原件印行、出版的时间均已久远，现存世稀少，且纸张脆化，墨色退变，会越来越严重地限制着其对后人学习、研究的作用。

山西财经大学是国内建校时间最早的财经类高等学校之一，是从乔家大院走出来的商科大学。经济学、管理学始终是学校的优势学科，晋商研究始终是学校科研工作的特色之一。近年来，学校为了提高教育质量、突出办学特色，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商科大学教育教学模式的要求，明确将传承晋商文化、弘扬晋商精神、构建学科体系、培养商科英才作为办学指导思想，并加大了各项投入，在科学研究、课程改革、教材编写、博物馆建设等多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为了便于学界同仁学习和研究，把晋商文化教育和晋商史学研究工作推向深入，我们对民国时期出版的有关文献进行了搜集整理，编辑成册，资助出版了这套“晋商研究经典文库”。

文库首批共有五册，分别是：

卫聚贤著《山西票号史》。根据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 1944 年版重印。原书为繁体竖排，重印时改为简体横排。另外，原书末附录有 11 篇（包括文后附文共 15 篇）文稿，为了方便读者查阅，并出于对原作者的尊重，我们在编辑时将这些文稿抽了出来，汇集在本文库之《晋商研究早期论集（一）》中，本书末只列有附录文稿的目录，不再重复文稿内容。

陈其田著《山西票庄考略》。根据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重印。原书为繁体竖排，重印时改为简体横排。

《中国实业志·山西省·金融》。根据（民国）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山西省》（华丰印刷铸字所 1937 年版）第八编“金融机关”重印。

《晋商研究早期论集（一）》。汇编了关于山西票号的调查报告、论文、信函、演讲稿等共计 29 篇。

《晋商研究早期论集（二）》。内容包括专门讨论山西金融业的论文、

调查报告，涉及山西票号的论文、调查报告，关于汉口、库伦、营口等晋商活动重镇的商业金融问题的调查报告和论文，作为票号衰落时期背景知识的有关文献，共计37篇。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尊重历史事实，保持原书风貌，在本文库的编辑加工过程中对原书的文字表述、体例、年代及数字表示、计量单位等均未作改动。此外，本文库的出版纯为学术研究之目的，加之出版在即，时间紧迫，虽经编委会一再联络，亦未能与上列个别著作权人及单位取得确切联系，相关事宜请致信本文库之编委会。

希望本文库的出版对社会各界有所裨益！

杨怀恩　原梅生

2007年12月31日

山西财经大学
《晋商研究经典文库》
编委会

学 术 顾 问：孔祥毅　张正明

编委会主任：杨怀恩　原梅生

编　　委：樊而峻　郭泽光　赵国浩　崔满红　王　森
　　黄鉴晖　葛贤慧　武三林　阎应福　孙长青
　　张亚兰　王永亮　乔　南　陶宏伟

主　　编：崔满红

编辑部主任：王永亮

编　　辑：陈　啸　薛秀艳　杨志勇　侯海燕

目　录

第一章　山西票庄起源的传说…… 1

第一节　山西票庄起于隋末唐初说…… 1
第二节　票庄起于明朝中叶说…… 4
第三节　票庄起于明末清初说…… 4

第二章　清代山西票庄的沿革 …… 11

第一节　山西商人与山西票庄的关系 …… 11
第二节　清代山西票庄的起源 …… 12
第三节　山西票庄发展概况 …… 17

第三章　山西票庄的衰落 …… 21

第一节　票庄衰落的原因 …… 21
第二节　票庄失去改革的机会 …… 24
第三节　民国以后山西票庄的一般状况 …… 28
第四节　各地各号票庄的衰落 …… 30

第四章　山西票庄的派别和组织 …… 36

第一节　平祁太三帮的票庄 …… 36
第二节　四十九家票庄一览表 …… 38
第三节　外省、外县的票庄 …… 41
第四节　票庄的组织 …… 41
第五节　总号与分号的关系 …… 47

第五章　山西票庄营业的概况 …… 52

第一节　营业地域 …… 52

第二节　营业种类 …… 58
第三节　票庄代汇公款的举例 …… 69
第四节　营业和获利的估计 …… 74
第五节　票庄营业的考核 …… 76

第六章　山西票庄对外的关系 …… 79

第一节　票庄与政府官僚 …… 79
第二节　票庄与钱庄 …… 83
第三节　票庄与对外贸易 …… 84
第四节　票庄与其他机关 …… 85

第七章　结语 …… 88

附录一　论材料 …… 89
附录二　山西票庄调查表 …… 94
附录三　山西资产家一览表 …… 102
附录四　日升昌和大德通近年营业统计 …… 104

插图目次

图一　平遥雷履泰故宅 …… 14
图二　平遥日升昌票庄 …… 16
图三　祁县大德通票庄 …… 34
图四　会券 …… 59
图五　新式汇票三联单 …… 60
图六　兑条 …… 61
图七　借券 …… 70
图八　小票 …… 72
图九　票庄代汇之公款统计 …… 74

第一章　山西票庄起源的传说

山西票庄的起源，传说不一。根据各种文献及口传所说的，可以分作四种：①隋末唐初说；②明朝中叶说；③明末清初说；④清朝乾嘉说。这四种传说都没有充分的证据，也没有详细注明传说的来源，简直是无法考究。我们以存疑的态度，一一叙述于后，希望将来能够得到相当的材料，可以估定这几种传说的价值。

第一节　山西票庄起于隋末唐初说

清末的时候，上海著名的传教士艾约瑟博士（Dr. Joseph Edkins）替海关外人编著《中国金融财政史料》丛书，第三本叫做《中国银行与物价》，书未完成身先死，残稿由其友人在他去世那一年（一九〇五年）替他发表，内容未经整理颇见凌乱。关于山西票庄有几条零碎的记载。第一条以北京的四恒当做山西票庄，这是错的（参阅第四章第三节）。第二条提到山西票庄起于纪元后六百年，即隋末唐初，说："山西票庄财富的基础从很早起就建筑在盐铁上头，这种宝贵的物产，自山西出口，甚为丰富，有二千年的历史。前几年在山西发现罗马的钱币，大概是罗马商人在山西买铁做货样所给的。山西商人游行远近各地，招揽生意。因为营业发达，他们就成为银行家。二千年前，气候较为温和，中国的丝是山西的一种出品。但盐铁的重要性，可以汉朝的盐铁论为证。……古代的山西商人输送货物于邻省——直隶、山东、河南和陕西。他们从纪元前六百年（周定王七年）起就做这种买卖，纳税或以当时新铸的钱或以金银。但是到纪元后六百年唐朝时候，因山西商人积蓄甚富及用纸盛行，他们就成为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行家。”

“山西票庄从甲省到乙省汇兑，只收三厘以下的汇费。西历一二〇〇年（宋宁宗庆元六年），北京已经成为首都（应指金都于燕而言）始用煤炭。山西煤炭加增山西商人及银行家的利润。他们的资金堆积，不但扶助政府，而且利及各地商人。”（注一）

艾氏的书出版后十年，一九一五年，又有一个外国学者瓦格尔（S. R. Wagel）著《中国金融与银行》（Chinese Curreney and Banking），第四章中国的银行，对于山西票庄竭力赞扬，甚至说：“近代汇票和贴现的办法，是山西票庄首先倡用的。他们教世界上的人类，如何由甲地送钱到乙地，或由甲国到乙国，不必搬运现银。他们采用支票方法——当然不是现代的支票而是一种纸票，使人到外埠去的时候，不必携带现银，只带一张纸票，到处都有购买力。”（注二）关于山西票庄的起源，瓦氏抄袭艾氏的传说，但未注明出处。文字几乎完全相同，不必重译。（注三）除了附和山西票庄起于西历六百年之外，瓦氏还说中国古代各省赋税，或以货物，或以银两，输送北京（应改为京都），依靠银行转运。“山西银行家，其历史极有趣味，从西历九百年（唐昭宗光化三年）就已经起手经营这种事业。”（注四）“到十一世纪（宋朝），山西票庄从实际上看来，很像国家银行了。”（注五）

再过十年，一九二三年，马寅初先生《论吾国银行业历史上之色彩》，是一篇专门研究山西票庄的文字，虽未注明出处，内容与瓦格尔的书颇有雷同。不过马先生对于山西票庄的起源，删掉瓦氏师承艾氏所肯定的时期，只笼统地和西洋银行比较如下：“今之谈银行业者，每谓欧美银行组织完备、发达迅速，而吾国之银行业尚属幼稚无足述者。殊不知吾国银行业极盛之时，英、美、德、法诸国尚在草昧时代，几不知银行为何物也。尝考吾国银行业发轫于山西，盖山西出产以盐铁为大宗，丝煤次之，自给之外余额悉运销于外省者，换得之现银，不可无特殊之机关以任运送保管之责，于是山西票庄兴焉。山西帮之成为银行家者，固自然之结果，亦环境使然也。”（注六）又说：“山西票庄既遍设分庄于各处，公私汇款当然由其独揽，其汇划之唯一武器则为汇票，英语谓之 draft。此项汇票随在可以兑现，几无所往而不有购买力，票庄汇票之所以可贵在此。当汇票盛行之时，英、美各国尚不知汇票为何物，若谓汇票系山西票庄所发明亦不为过。”（注七）

我们在这里所要研究的是山西票庄起源的问题。艾氏、瓦氏和马氏都说票庄的兴起是山西商人往外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论断自经济立场看来颇有见地。但是有几个问题是必须讨论的。第一，山西商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往外发展呢？艾氏举山西发现罗马钱币，想象大概是罗马商人来山西买铁。瓦氏把这事当做历史的证据。据我们看来，欲以此事证明山西商人年代的久远，理由很不充足。罗马钱币不一定是罗马商人带来买铁的，或系后来过路人所遗失。且古代交通甚为不便，从山西带铁到罗马去似乎不大可能。艾氏及其他学者主张，山西商人从纪元前六世纪起（周朝）输货于邻省可能性较大。我国古代经济中心是在黄河流域，山西虽以尚武称世，但其四围邻省都是富庶的地方。纪元前二百四十年，吕不韦以阳翟大贾做秦相（阳翟即今河南禹县）。河南大贾可以到陕西做官，则山西商人运货于邻省不是不可能的事。这种推测如果有理的话，那么山西人对外省贸易最少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第二，山西商人既然有这么长久的历史，在什么时候，他们因为营业上的需要才兼办银行业务呢？艾氏断定为纪元后第六世纪（隋末唐初），并举出两种原因，山西商人经商致富，资金雄厚及纸币盛行，二者均系票庄成立的重要条件。瓦氏一面附和艾氏山西票庄起于第六世纪（隋末唐初），一面说："……山西票庄从十世纪起（五代宋初）到一九一一年才消灭……"（注八）自相矛盾且前后相差四百年！到底唐朝有无山西票庄是个绝大的疑问。查中国汇票的起源创始于唐宪宗时。据《新唐书·食货志》说："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注九）这些商贾及富家是否为山西人，史无明文不易断定。马寅初先生想汇票是山西票庄发明的，不是根据唐书恐是沿用瓦氏的言论。瓦氏对于中国历史的知识至为模糊，不若艾氏远甚。艾氏述译飞钱制度颇详，指为官办并未与山西票庄混为一谈。据我们的意见，以唐朝的飞钱做山西票庄的起源未免过于穿凿。第三，山西商人及山西票庄，什么时候与政府发生关系？瓦氏谓山西票庄在西历九百年（唐昭宗光化三年）即已代营国库，由各地轮送金银货物入京，到十一世纪（宋代）俨然是国家银行。唐朝赋税贡物由诸道轮送中央政府，虽有转运使的组织需要商人包运，事甚可能，但是山西票庄经营斯业苦无证据。至于以山西票庄为宋代的国家银行，恐怕是交子和会子制度的错误。

唐宋山西票庄的传说，事极渺茫，不易研讨。诸氏所说的有许多地方

是牵强附会，不足凭信。我们特意举出，留待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家的修正。

第二节　票庄起于明朝中叶说

上海《银行周报》登载东海先生记《山西票号》一文，说山西票庄是在明朝中叶兴起的。“当时成立未久，势力犹尚薄弱，营业区域仅限于北京之少数地方。及至李闯之乱消灭殆尽。”（注十）日文《支那杂志》《山西票庄》一文，也有同样的意见，“山西票庄的创业，虽起于明朝中叶，但是当时的力量很微弱，不甚可观”。（注十一）这两篇文章，虽同主张票庄起于明朝中叶，可是没有举出什么证据，而且两位作者自己认为不甚重要，恐怕也是不可靠的传说罢。

第三节　票庄起于明末清初说

还有一种传说，时代和上面所说的相接而流播很广，便是明末清初说。据此说，山西票庄的起源资本是从李闯王得来，顾炎武定章程造成票庄三百年的伟大基业。我们姑举下面几条来做此说的代表：

（一）《支那经济全书》论山西票庄的起源说：“据说开始是山西的康氏。清初顺治年间李闯王造反不利败走时，所有的金子携带不便，便把军中所有的金银财宝放在康氏的院子里而去。康氏忽拾得八百万两，因此将从来谋一般人便利的山西汇兑副业改为本业特创票号，至是该地的巨商都是康姓。”（注十二）中文译本，申引其意，改数目字加上地理的方位演绎如下：“……其始康姓者，于清初顺治年间闯贼以兵不利败走，遂以频年窃取之金银财货悉置于康氏之家，全为康氏拾得突成巨富传说约有千万两。由是极力经营商业，始于山西省垣，设立票庄以便交通，颇获厚利。复以东南之商业频繁，遂扩张其势力于东南各大商埠，亦颇获利。于是山西之豪富效之，遂视此为专业，逐次推广。今日清国之各商埠，几无处不

有山西票庄之营业云。”（注十三）

（二）徐珂的《清稗类钞》说：“相传明季李自成掳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其号中规则极严，为顾炎武所订。遵行不废，称雄于商界者二百余年。”（注十四）

（三）商务印书馆的《辞源》票号条文与《清稗类钞》相同，略改几个字而已。“相传明季李自成掳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其号中规则极严密，相传为顾炎武所订。遵行不废，故能称雄我国商界者二百余年。”（注十五）

（四）上海《申报》五十年纪念册张一麐先生《五十年来国事丛谈》一文也提到山西票庄的起源如下：

“莫打鼓来莫打锣。

听我唱个因果歌。

那李闯逼死崇祯帝。

那文武百官一网罗。

那闯将同声敲夹烙。

霎时间金银堆积满严阿。

冲冠一怒吴三桂。

借清兵驱贼出京都。

贼兵舍不得金银走。

马上累累‘没奈何’（金银大块名）。

一路追兵潮涌至。

把金银向山西境上掩埋过。

贼兵一去不复返。

农夫掘地富翁多。

三百年票庄称雄久。

不成交法孰磋磨。

相传是亭林青主两公笔。

这一桩公案确无讹。”（注十六）

（五）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木村欣一教授的《支那政治地理志》，也主张山西票庄起自明末清初。“票庄的命运是与清朝相终始。其中详细的情形，虽然不得而知，但是明末清初的时候，天下大乱，山西人在直隶经营颇获巨利，乃交结清廷官吏，一手包办全国国库，代为运送中央。……”又

说："清朝兴起之后，山西人有姓康的，与新兴政府结托，承继明代的汇兑事业。后来得到族人及同乡的援助，业务益见广大。……"（注十七）

除了上面所举的几种资料之外，其他中日文的书籍杂志附和山西票庄起于明末清初说，不胜枚举。单就我们所引的五种材料来说，《支那经济全书》最早，出版的年代是在明治四十年，即一九〇七年，以后其他日文书籍所记载的，大半是根据这部书而来的。《清稗类钞》出版在民国六年，即一九一七年，比《支那经济全书》迟十年，书中只提李自成的巨款，而把数目字取消，只说山西人而不提康氏，恐怕是自《支那经济全书》演绎而来。但是顾炎武与票庄的关系，却是《清稗类钞》的创见。

关于明末清初说，我们应当注意的有三点：第一，李自成的巨款沦为票庄的资本；山西康氏用李氏的款项创设票庄；顾炎武拟定票庄的规则。李自成携带巨款西行，我们有明史二则为证。周奎传："李自成逼京师，帝遣内侍徐高，密论奎倡动戚输饷。奎坚谢无有。高愤泣曰，后父如此，国事去矣。奎不得已捐助万金，且乞皇后为助。及自成陷京师，掠其家得金数万计。"（注十八）又李自成传："……动戚文武诸臣奎、纯臣、演、藻德等，共八百余人，送宗敏等营中拷掠。责赎赂，至灼肉折腔，备诸惨毒。藻德遇马世奇家人泣曰，吾不能为若主，今求死不得。贼又编排甲，令五家养一贼，大纵淫掠，民不胜毒，继死相望。征诸动戚大臣金。金足辄杀之。……自成自永平奔还京师悉熔所拷索金，及宫中帑藏器皿，铸为饼，每饼千金，约数万饼，骡车载归西安。"（注十九）张一麐先生解释自成挟金遁走，金重马乏，清兵追逐又急，中途遗金山西很多。载归西安，恐怕只有一小部分而已。到底自成所挟走的巨款，有多少到西安，有多少中途遗弃山西，不得而知。据《明季实录闯贼逆天始末》顺治元年，四月初，记李自成谈话："又常曰十个北京不及一个陕西，故所掠金银尽搬驼西去，其志可知矣。"（注二十）此事在清兵入北京前一个月，金是不会送给山西人的。《明史李自成传》载四月二十二日自成在山海关战败，奔远京师，载金饼归西安，二十九日僭帝号，五月二日清兵入京师，前后相去十日，金饼尽可从容运过山西。自成走的时候是且走且战，先到定州，清兵追到，西走，后来中流矢创甚，西逾故关入山西，清兵东返，李自成走平阳。可见打仗是在北京与山西间这一段，山西至西安间因为清兵东返，假如金饼还未运到，尚可平安搬运。清兵攻潼关是在九个月之后，如有遗金山西也可索还，谁敢抗拒悍贼呵。退一步来讲，数万金饼如真遗落山

西，一定是四散，不会以八百万放在康氏家里，做票庄的资本。

第二，康氏首创票庄，很少根据，较难研究。《支那经济全书》盛赞这位姓康的隆运，集山西全省的精华于一家，历二百年而不衰，大有山西票庄的历史简直就是康氏的家乘。（注二十一）可是我们细查近代山西票庄各号资本主的名单及富人表，找不出一个姓康的来。东亚同文会出版的《第一回支那年鉴》（明治四十五年，即一九一二年）有一张山西资产家一览表，历举三十几个户名及资产额，独不见康氏的名字。《清稗类钞》也有一张山西富商表，似乎根据《支那年鉴》而删掉二十万以下的十几个名字。康氏仍未列入。不过表前小引有这样一句话："山西富室多以经商起家。亢氏号称数千万两，实为最巨。"（注二十二）平常北方人提到豪富常说，"山东孟，山西亢"，或谓"南季北亢"。据说山西这位富户亢氏系以盐米致富。这样看来，《支那年鉴》的康氏恐怕是亢氏之误。这位亢氏既已经商发财，自然不必借用李闯的遗金来做票庄的资本。我们猜想亢氏经营商业，间或尝用汇兑方法，甚至替人汇款，也是可能。但是有什么证据呢？日人论山西票庄的起源，除了《支那经济全书》及《支那政治地理》外，很少宗奉亢氏（或康氏），这两部书所载的传闻，恐怕也是无法证明的臆说罢。

第三，顾亭林与山西票庄的关系，是个很有趣味，同时也很复杂的问题。据书本记载，有下列三种。《清稗类钞》："……其（指山西票庄）号中规则极严密，为顾炎武所订。"（注二十三）商务印书馆的《辞源票号条》："其号中规则极严密，相传为顾炎武所订。"（注二十四）《辞源》虽未注明出处，似引《清稗类钞》而加上"相传"二字，表示不如清稗那么肯定了。张一麐先生《五十年来国事丛谈》说："作者于民国三年，因事与山西票庄相往来。一日问其掌柜曰，日本人辑《支那经济全书》，虽一纸白契，或一张收条，皆不惮烦琐为之钩摹证明。独徽州当铺与山西票庄，竟无从得其章程。当铺姑勿论，试问票庄何以有不传之秘？掌柜（亦士而商者忘其名）答余曰，此贵省顾亭林先生所定之不成文法，而以口授不以笔传者也。先生游太原，与傅青主先生最友善。是时山西富人多赀财，二先生乃为酌定票庄制度，以操纵全国金融，不愿宣之笔墨以招当世之忌。"（注二十五）是则傅青主与顾亭林同为山西票庄的立法人。

我们在山西调查时，也常听见顾亭林与票庄的关系，可惜没有得到什么证据。遍查亭林先生《遗集》、《日知录集释》、《日知录之余》、《天下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